

## 越南近现代写自传的第一人

——潘佩珠及其《潘佩珠年表》初探<sup>①</sup>

夏露

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几千年来其文化与中国关系至为密切，反映在传记文学上亦如此。受《史记》等中国史传文学的影响，越南很早就有《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等史传文学问世，甚至连最早的小说《岭南摭怪》、《粤甸幽灵集》等也深受中国史传文学影响。不过，与中国一样，越南传记文学虽然有光辉的起点，而且源远流长，但却始终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演变，直到20世纪初才向西方学习，革故鼎新。如果说推动中国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方向发展的人是梁启超；那么在越南，起到桥梁作用的则是潘佩珠。不同的是，梁氏的优秀传记作品多为他传，潘氏虽也有多部他传，但其最有代表性的则是自传，尤以《潘佩珠年表》特别突出。越南现当代传记文学作品主要以个人回忆录为主，不能不说有此书的巨大影响。

《潘佩珠年表》创作于1928—1929年间。<sup>②</sup>这部结合中西风格的自传起初用汉文写成，后来又由作者亲自翻译为现代越南文。对这样一部极具文史价值的传记作品，越南学界多从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角度加以研究，但却罕见从传记文学角度加以研究。究其原因在于，传记文学研究在越南尚属于一块处女地，至今也未引起重视，相信随着越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将来一定有人从更多角度来研究这部自传。在此，笔者不揣谫陋，愿将一孔之见行诸文字，目的在于通过揭示越南

作家传记文学之一斑，为我们从汉文化整体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和东亚比较文学提供一些材料，且从中观察东亚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共同特征。

### 一、潘佩珠生平与《潘佩珠年表》

潘佩珠，字是汉，号巢南，又名潘文珊。“是汉”表明其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及对汉文化的深切向往。“巢南”则取自中国《古诗十九首》中“行行复行行”一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潘氏此名，可谓一语双关。纵观潘氏的一生，无论其革命活动还是文学创作都与中国息息相关，尤其是他的传记文学创作，更是在梁启超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

潘佩珠于阮朝嗣德二十年(1867)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南坛县东烈乡的一个乡学教师家庭。其父潘文谱通晓儒家经书，一辈子从事“砚田笔耕”；母亲阮氏娴亦略通汉学，曾为幼年潘佩珠口授诸多儒家经典。潘佩珠出生时，法国已占领越南南圻六省五年，且不断向北入侵，于1885年完全吞并越南；而他1940年去世时，越南尚未摆脱殖民统治。因此，他的一生都处于国破家亡之中。正如他在《年表》中所说：“予生之年，为我国南圻亡后之五年。呱呱一啼声，已若警告曰：汝且为亡国人也。”<sup>①</sup>幼年潘佩珠聪慧好学，由于母亲教导，他“四五岁时，不识字，乃能诵《诗经·周南》数章”。6岁时被父亲带至私塾，“授余汉字书，才三日读尽三字经”。1874年，义静的爱国文绅提出“平西”<sup>②</sup>(即反法)口号，奋起抗法，7岁的潘佩珠曾与小朋友以竹竿为枪，以荔枝核为弹，扮成“平西军”，作战斗游戏。潘佩珠很早就显示出写作天赋。8岁已“能作时俗短文。应乡里县小考，辄冠其军”。13岁“已能作近古诗文”。1882年他15岁时，法军再次侵略北圻，占领河内城，他闻讯连夜写出《平西收北檄文》，声讨法国殖民者，呼吁收复北圻失地。勤王运动掀起后，他对领导义静地区勤王起义的领袖潘廷逢等异常钦佩，1885年，潘佩珠聚集百名同学，组成勤王军。18岁时，母亲去世，他以教书为生，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幼的妹妹。19岁时法军攻陷义安城，“义静绅豪悉奉出帝勤王诏起义。”与友陈文良募试生六十余人组织试生军，未及行动而解散。此后十年间以教书卖文为生，交结“绿林亡命及勤王余党”，准备在适当的机会起事。咸丰八年(1897)，潘佩珠31岁时“干怀挟文字入场，终身不得应试案”。其后，他游北圻，走顺京，寓居在安和武家，结识邓元谨、阮尚贤等人，并曾读到从中国购回的《中东

<sup>①</sup>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课题(05JJ075D. 47 - 99161)，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sup>②</sup> 对《潘佩珠年表》的创作年代，最近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1937—1940年间，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1928—1929年间。

<sup>①</sup> 潘佩珠的生平事迹除加注外，其他均引自《潘佩珠年表》中文版，并参照越南孙光阁的越南文译本——潘佩珠：《自我批判：越南近代革命史参考资料》一书。

<sup>②</sup> 在越南一度称法国人为Thăng Tây，直译为“西佬”，实际是“法国佬”或“法国鬼子”。

战纪》、《普法战纪》、《瀛寰志略》等书。

潘佩珠主张暴力反法，曾读过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赞赏意大利革命志士玛志尼的“教育与暴动同时进行”的思想。“九月父以七旬告终”，从此放心开展革命，在家设帐授徒，实则集党议事。同年夏，与潘伯玉、王叔季等数十人“谋于法共和纪念日袭义安城”，因内应延误日期而失败。1904年四月组织维新会，推圻外侯阮骥祗为会主，筹划在国内暴动以推翻殖民统治及到国外寻求援助。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得到当时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的敬佩。越南的进步士大夫曾推尊日本为“黄种老大哥”，对它寄予殷切的希望，希望它能将越南从白种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于是到日本去寻求援助成为潘佩珠的主要目标。1905年正月他由曾拔虎带领，偷渡到中国，乘洋船到香港转至上海，四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国内期间，潘虽曾读过梁启超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但他大量地阅读梁的著作则是到了日本以后。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其富有感染性的文章对越南进步士大夫的影响很大。作为当时社会思潮的先锋，潘佩珠当然不是旁观者。潘在《年表》中亦说，他曾读过梁的《中国魂》、《戊戌政变记》、《新民丛报》等。潘从上海到日本去时，“适上海船中遇留美学生周椿君回国，为予道梁先生住所，则为日本横滨山下町梁馆。予大喜，于一到日本则必先谒见梁”。他来到横滨后数日，便设法与梁启超见面并几度笔谈。《年表》记潘梁会晤事：“越数日，修一书，自介为梁启超先生。书中有句云：落地一声哭，即已相知；读书十年眼，遂成通家。云云。梁得书，大感动。邀余人。酬应语多曾公译之，心事之谈，多用笔语。梁公欲悉其辞，约于次日再会。”笔谈中，潘佩珠向梁启超述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南人不屈斗争精神，令梁十分感动，曰：“哀哉伤哉！客言信耶？果尔者，我国其犹惭诸！有人如此，国其能终亡？”<sup>①</sup>他向潘佩珠建议：“现时只有二策为能贡献于君者。其一，多以剧烈悲痛之文字，摹写贵国沦亡之痛状与法人灭人国种之毒，宣布于世界，或能唤起世界之舆论，为君策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国，或以文书寄回国内，鼓动多数青年出洋游学，藉为兴民气、开民智之基础，又一策也……”

同梁会见后不久，潘便撰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由梁启超作序并于1905年9月在梁启超的资助下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成书。《越南亡国史》是越南第一部革命史书，也是越南第一部国际宣传资料（一说此书由潘口述，梁执笔。后人整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曾将此书作为梁氏著作收入合集第6卷专集之十九）。不

<sup>①</sup> 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久，潘又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写《劝国人游学文》，发动越南青年留学日本。到1907年，已有两百人左右到日本读书。此即近代越南史上著名的“东游运动”。法国殖民地政府阻挠此一运动，给出国学生家长施加压力，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越南学生。1908年9月，日本政府解散留日越南学生的组织越南公宪会。1909年2月，又驱逐潘佩珠出境。自此，“东游运动”结束。潘佩珠在日本初期受到梁启超很大的影响，他所执行的几乎都是梁启超给他设计的路线。另外，也是通过梁的介绍，潘才结识了日本政要以及在日的中国云南籍留学生。这一时期潘佩珠的世界观和国际关系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梁启超在这段时间与潘佩珠接触，对潘的印象及感情相当好。第一次见潘佩珠，梁“望而知为异人也”。在同潘佩珠与日本政要犬养毅交谈时，欣赏潘佩珠的汉学才华，梁赞叹“此人大可敬”。

但与此同时，他亦接触中国革命党人，并与他们有更多的交往。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犬养毅介绍潘佩珠和孙中山晤面，于横滨致和堂谈话两夜。《年表》中描述了潘佩珠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的情形：

又一日，犬养毅以一书招予至宅，为予介绍于孙逸仙先生。孙，中国革命之大领袖，时方由美洲回日，为组织中国同盟会事，逗留横滨。犬养毅谓予曰：“贵国独立，当在革命党成功之后，彼党与君同病相怜，君宜见此入，豫为后来地步。”越日予持犬养毅名帖及其介绍辞，诣横滨致和堂谒孙，时夜八点矣。孙出笔纸与予互谈革命事。孙曾读《越南亡国史》，知予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而其结束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予所答词，则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而其主意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予与孙辩解相持有数点钟之久。夜十一点，予起辞别，孙约予以次夕再会谈。越后日复在致和堂会孙，再申明前夕所谈之意。其实予与孙此时两皆谈会，予实未知中国革命党内容如何，而孙亦未知越南革命党真相如何，双方谈解，皆隔靴搔痒耳。结果俱不得要领。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

在日本的会面开启了中越两党之间的合作。1907年7月，孙中山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以及1908年黄兴由越南率领革命军攻钦州，都有潘佩珠领导的越南维新会党员参加；而潘佩珠及越南革命党人在中国的活动，也得到中国

革命党人的协助。1908年10月潘佩珠与章炳麟、张继、景梅九，日本人大杉荣、宫崎滔天及印度、菲律宾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组织东亚同盟会，旨在促进东亚革命党人间的合作，但此组织活动仅数月便为日政府禁止，潘佩珠被迫离开日本。此后，潘佩珠仍来往广州、香港等地，组织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成功后，潘佩珠应章炳麟之邀由暹罗至广州。1912年2月，与诸同志在刘永福家开会，宣布解散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阮疆抵任会长，潘佩珠任总理。潘佩珠提出光复会的政纲为“驱除法贼，恢复越南，成立越南共和国”。思想上，他已从保皇转向革命了。

1912年2月下旬，潘佩珠前往南京见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孙中山百忙中接见潘佩珠，又嘱咐陆军总长黄兴与潘佩珠会谈。黄兴建议潘佩珠选派越南青年到中国学习。潘佩珠又到上海，会见了港督陈其美，陈馈赠四千块银元，送军用手榴弹三十个，助其革命。1913年袁世凯任命龙济光(1876—1925)为广东都督，8月，龙率兵占广州。1914年7月法东洋全权总督沙露氏(Albert Sarraut)亲至广东，要求龙济光引渡越南革命党。12月龙氏逮捕潘佩珠、梅老蚌，提出引渡潘、梅两人的条件是借用滇越铁路运兵回云南镇压反袁派，但法国殖民政府未答应此条件，同时因潘佩珠还得到段祺瑞等保护，最终未被引渡，拘于陆军监狱。后来，护国军打败龙济光，龙退至海南岛，潘佩珠亦被带到海南，1917年3月才获释。潘氏在狱中写下其第一部自传《狱中书》，同时还创作了《重光心史》、《再生生传》、《余愚忏》、《黄安世将军别传》、《渔翁翁别传》、《小罗先生别传》、《河城二烈士小传》、《国魂录》、《人道魂》、《建国檄文》等自传体小说、传记、杂文等等，此外，还有“其他短篇，则并其名目而忘之”。出狱后，他来到广州，后又去日本，与阮疆抵晤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11月，潘开始研究共产主义，曾翻译日人布施辰治所著《俄罗斯真相调查》一文为汉文并携带其译书至北京拜会蔡元培，蔡曾介绍其结识俄使馆人员。1920、1921年间他数度往返于杭州、北京、广东，偶尔也经东三省入朝鲜到日本。他在为革命奔波中，时常提笔著文，留下了大量著作，曾“应杭州军事杂志总理林亮先生之邀任编辑员。计三年又四个月。其间输入越南之著作有，小册子三种：《余九年来所持之主义》、《医魂丹》、《天平帝乎》；长文三种：《敬告我国内青年文》、《敬告我侨暹同胞文》及《敬告邻邦暹罗政府文》”。1923年6月15日他还为韩国志士申圭植著《韩国魂》作序。

1924年，潘佩珠筹改越南光复会为越南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逝世，潘佩珠作挽联云：“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胎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压迫多年，痛分余泪泣先生。”同年5月11日至上海被法国秘密警察绑架至法租界送回越南，被河内刑事法庭判终身劳役。但迫

于国内外压力，印支全权总督瓦兰(Varenne)特赦潘佩珠，将其软禁于顺化，直至1940年10月29日去世。<sup>①</sup>《潘佩珠年表》即为其1928—1929年间被软禁于顺化时所著。<sup>②</sup>

## 二、个人与时代融为一体——《潘佩珠年表》的写作特点

从题目看，《潘佩珠年表》仿佛只是个人的大事编年，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伟大灵魂的自我剖析，有丰富而实际的内容。《年表》的写作是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直到现在，对潘佩珠的各项研究也还没能超出他本人在自传中的认识。在《年表》中，潘佩珠吸收了卢梭《忏悔录》那样直接而深刻的解剖法，同时又将个人经历贯穿于丰富细致的历史述说中。

《年表》的结构分为序、自判、第一纪、第二纪、第三纪等几个部分，从文字分量上看，这几个部分越往后越重，这大概是最为详细的个人“年表”了。潘佩珠在《年表》中专设“自判”一节，坦诚自己的优缺点，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在越南传记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余之历史，固完全失败之历史。然其所以得此失败者，病痛处诚甚显著；而其所可自豪者，亦不敢谓完全无。今于未入正编之前，特摘举其大概，有数端如下：

- 一、自信力太强，谓天下无一事不可为。此为不量力度德之罪。
- 二、对待过直，谓天下无一人不可信，此为无机警权术之罪。
- 三、料事料人惟注意其大者，乃至微行细故多任直率意行之，往往因小故而误大谋。此疏略不小心之罪。

以上三者，其最大病痛处也，余姑心诛，不能尽述。

- 一、冒险敢为，尝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概，而于壮年辰尤甚。
- 二、与人交接，苟得一言片善，亦终身不能忘；而于忠告痛责之辞，尤所乐受。

<sup>①</sup> 笔者曾于2000年3月在顺化瞻仰潘佩珠故居，见其屋为泥墙草顶，十分简陋。院中有后来者所塑潘佩珠上半身巨幅石雕，类思想者貌。

<sup>②</sup> 法国吞并越南后，于1919年正式取消汉字的官方文字地位，采用拉丁化越南文。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仍有部分喜好汉文的人自愿学习汉文。潘佩珠被软禁期间，曾有十几个学生跟随学习汉文。潘为了逃避监视者耳目，将书稿写于汉文教科书之背而行间或字间，与原书混杂甚或重叠。写作过程中，陆续将所写内容交给与之往来甚多的黄叔抗(1876—1947)，黄亦为当时越南著名文人，黄氏帮忙整理印行。及后有多重抄本流散世界各地。越南堤岸《远东日报》，曾于1962年8—9月连载此书。此书日前有多种当代越南文译本及法文、英文译本。

三、毕生所营谋，专问目的，期取胜于最后之五分钟。至于手段方针，虽更改而不恤也。

以上三者，每自谓足录之寸长。知我、畏我，皆所承认。

这部自传显然是在接受西欧自传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与西欧自传相异的那种独特东亚色彩也同时与生俱来。从忏悔、告白出发的西欧自传其本质是自我审察，即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然回顾昨日之我，乃知自己之非。作为“精神的自我形成史”的“西欧自传”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和越南的自传一般缺少忏悔、告白那样自我批判的性质。郭沫若《少年时代》的《序》已凿凿有言：“我没有什么忏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中国独具的自传的鲜明特色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有过这样的人生的时代”。就是说，社会是个人的背景，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紧密结合社会、时代来描述个人的方式，正是与缺乏自我审察精神互为表里的中国式自传的重要特征。

胡适的《四十自述》，说自己作为历史学家训练有素，因而总会不知不觉地把自传写成史传的体裁（《自序》）。潘佩珠也是如此，他的自传带有史传色彩，命名为《年表》即有此意。这也表明，受中国文化影响深刻的潘佩珠，其自传里，个人与时代密不可分，作者记录的不仅仅是个人，记录时代抑或在个人之上。潘佩珠在《年表》中极少提到他个人的生活。除了表彰父母并阐明自己的孝心之外，没有一字提到他个人的家庭生活。<sup>①</sup> 进入 20 世纪才在西欧影响下产生的越南自传，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郁的越南特色或曰汉文化特色。秉承着本国的传统，越南历史上英雄人物传记非常多。20 世纪初，不少作家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创作了一些如《南国伟人》、《南国佳事》等群传，但真正写传记一生经历的自传则是始于潘佩珠。

潘佩珠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划分为三个时期，至今，在越南文学史上讲到潘佩珠的文学成就也一般是按照这三个时期来分述的。潘佩珠生活的时代，越南至南向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与此同时，掀起了勤王、东游、维新、暴力革命等多次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潘佩珠并非旁观者，他几乎参与所有运动，甚

<sup>①</sup> 据黎庄翹《潘佩珠夫人》（载 1945 年 7 月 5 日印行《新越南》，第 15—16 页），潘佩珠 22 岁时奉父母之命与同县蔡氏莹结婚，婚后无子，蔡氏又为他纳妾，妻妾情同姐妹。妾生有一子一女，后蔡氏亦育有一子。潘离开越南前，为使妻子女免家庭受累，曾将离婚书交给妻子。1925 年潘佩珠被押解到顺化软禁前曾与妻子在火车站见面，妻子嘱咐他保持初衷，毋以妻儿为念，自此以后即未见面。潘曾与儿子谈及蔡氏，言及蔡氏知晓他在离开越南前参加的一切革命活动。妻子临终前，潘曾作《安慰临终之老婆》云：“廿年余琴瑟不相闻，昔雨凄风指影为火日，向孀儿探热泪，九泉下朋亲如见，向移山填海有谁相，伯天猜老汉把空拳。”

至成为其中的领导者，某种程度上讲，他是那个时代的缔造者之一。因而，他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脉搏融为一体，这也清晰地体现在《年表》的创作中。

个人与时代的融合，这在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中似乎也是惯例。例如蔡琰的《悲愤诗》、虞信《哀江南赋》等在回顾乱世狂潮裹挟下自己的不幸时，他们都是从包容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广阔视野着眼来关照自己、咀嚼命运的。越南古代文学深受中国影响，其古近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致的。这种将个人放在时代之中，对时代的记述与个人同等，甚至置于个人之上的叙事方式在越南古典文学中也是常见的，是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的。

自己述说自己，这种十分特殊的表现手段的出现，首先缘于其特殊的自我发现；因为被周围世界否定，于是觉悟到自己与周围的不同，或者是意识到自己切实的存在。而要想从社会的否定中获得自我回归，自我表白，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这种被强迫的自我确认的痛切感受，催发了中国自传的诞生，而他们对自己的叙述，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认识方式。因此在自传中描写的自己，总是一贯正确，注意自身的种种变化。如果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时发现与自己过去之我有异为契机的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发现自己与人类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潘佩珠的自传显然也是深受中国自传影响的。在序言中，潘佩珠阐明了自己的写作动机：

余自海外俘还，束身囹圄。蒙国民错爱，幸保残生，得与数十年行离影绝之亲朋同志重续旧缘。爱余者，恶余者，责望余者，知余与不知余者，咸欲悉潘佩珠之始末历史。嗟呼！余之历史，百败无一成之历史耳。流离奔波几三十余年，连坐之累，殃及郡国；党锢之狱，毒流同胞。每中夜抚心，仰天挥泪，蹉跎二十余载。惭负须眉，翹望无名之英雄有如饥渴。夫古来鼎新革故之交，扫荡涤清之役，无失败而能成功者曾有几何。法兰西建共和民国，经三四次革命而始成，其明证也。吾侪苟鉴于已往之覆辙，思改其所以败者，急筹其所以成者。求生路于万死之中，确定良方于折服之后。机事密则无破绽之虞，心德同以图洗血之业。有成功之一日，则潘佩珠之历史，宁非后起者之前车哉！蒙亲朋过爱，严促再四，汝必及其未死速修汝史，爰奉命而草是编，颜曰自判。

“聚散知无定，忧欢事不常。”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变化无常，但在这里作者至



少还昭示了他的基本人生哲学：直面人生的所有事件，悲哀不幸，也是人生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不沉溺于悲哀，而把悲哀对象化的态度。不会陷于悲哀中不能自拔，他们的眼前，还闪烁着新文学的曙光。

这种对个人的写真，其处理手法不是那种揽镜自照，悲从中来之类陈陈相因的旧套。还包含有那种请人为自己画像的办法，从外部来审视自己。看上去这是一种打破传统的办法，因为“生而作传，非古也。”而自己之所以犯忌斗胆写自传，是因为“蒙亲朋过爱，严促再四，汝必及其未死速修汝史”。尽管如此，这其中还是有担心死后身名俱朽，乘活着的时候先立案存档的想法。这种想法和用语，出于《论语》卫灵公篇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潘佩珠受到传统的影响，将自传命名为《年表》这样一种似乎古典的体裁，而实际上，在蹈袭以往的基础上，向近代的自传迈出了一步。

### 三、“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潘佩珠年表》的文史价值

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以为传记文学的价值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种想法其实是建立在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基础之上的。潘佩珠大约也是深谙此理的。不过，从其写作的目的看主要在于“给史家做材料的”，因此才有学者认为这是研究越南近代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潘佩珠将自传命名为《年表》，意味着他是要完全忠于事实的，要将自己的一生如实地反映给那些了解或不了解他的人。

历史性是《潘佩珠年表》的最重要特征。潘佩珠在自传中提到的历史事实起于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勤王运动”的失败。同时，20世纪初的维新运动、东游运动、东京义塾、中圻的抗税运动等等，都从历史的层面得到了广泛而切实的呈现。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潘佩珠的革命运动遭遇许多困难和失败，尽管如此，他们却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革命中，甘愿为民族解放流血牺牲。作者再现了那个时代，并深入到爱国与革命的社会精神生活中。而作者对于时代的再现又是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直接讲述亲历者的种种过往，这深深抓住了读者的心。

《潘佩珠年表》是极有史学价值的自传，它对于了解潘佩珠本人及20世纪初的越南民族解放斗争运动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第一个接触这本自传的人黄叔抗曾说：“这部‘自我批判’式的书正是潘先生写的自己的事情，它像一幅传神的画描绘和反映了过去六七十年间我国的历史……他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生，里面有对自己所擅长的事情的自信，也有对疏漏之事的悔恨。真相如何即如何

反映，决然没有铺陈优点而掩饰任何缺陷。”<sup>①</sup>正因为如此，从过去到现在，越南许多有关潘佩珠诗文、救国活动及思想乃至越南20世纪初的历史的研究都以这本书为值得信赖的资料。

但客观上，他优美的文笔，浓厚的抒情及其独有的叙事方式乃至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给越南的叙事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越南学者认为，“在我国，第一个写自传的可能是潘佩珠”<sup>②</sup>。潘佩珠写这部自传的时候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最忧伤的时候。这在他当时的诗歌中时常流露，如“茫茫尘海总堪悲，举目江河百事违。我已无家人亦客，天犹有缺地何依。”（《感怀》）“荒山月冷铃声苦，幽径风凄鹤梦深。挂剑墓门余宿愿，停杯天末寄哀吟。”（《哭友》）“凭谁借酒消长夜，抚剑长咆天地幽。”（《秋夜对月》）“人道新年喜，我以新年悲。志业百无成，老大忙相随。临风怅江梅，揽镜惭鬓眉。”（《新年辞》）“痛哭江山与国民，愚衷无计拯沉沦。此心未了身先了，羞向泉台面故人。”（《绝命诗三首》）他在自传开头写道：“可叹！我的一生都干了些什么呢。只不过是百分百的失败史罢了。”他在这样的境遇下写自传，自然也令这部自传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艺术也达到了一定高度。“潘佩珠写过不少自传，但可以说《年表》是其中的顶峰，它也是20世纪初越南爱国和革命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品。”<sup>③</sup>他以其真诚、值得信赖的笔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对个人的悲剧进行了深切的回忆与剖析。

不少研究者常常将《潘佩珠年表》中的事实与他1914年所作《狱中书》比较，探讨某些事件的差异。这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工作，不过，真理与谎言一样也有千副面孔。潘佩珠在写《年表》的时候，作家当然不会只简单地重复《狱中书》的内容。生活的丰富性也可以让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艺术手法来叙述同一事实而使之不会重复。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所叙述的一切事件和变故都不是客观描述，而主要是通过人物首先是“我”的讲述而出现。这一点使得作家既概括了事件、变故本身，也表明了讲述者在当时的生活的复杂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这是潘佩珠年表的独特的具有创造性之处。

如上所述，《年表》的特色不在于描写与作家相关的细节和人物，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判断异常深刻。在自传里，潘佩珠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用真诚的、开放的心态来描述复杂多变的历史，其中包含了为国为民的血泪。通过自传中的人物形象，读者不仅能看到其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也能了解到潘佩珠那为国

① 黄叔抗1946年在《潘佩珠年表》译本即将在顺化付印时的序言。

② [越]潘文重编选《潘佩珠：人与作品》，河内：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1页。

③ 同上，第332页。

民为生活的思想情感的一贯性与矛盾性。

在《年表》的最后,出现了著名爱国者、革命者阮爱国(即胡志明)的形象以及潘佩珠与阮氏的相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经过岁月沉浮,潘佩珠已认识到正确评价每一个人的社会角色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已经完成,要将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一切信心交给阮爱国和新一代。承认自己的局限性,肯定年轻一代的作用,这是需要非凡勇气的。

《年表》问世时,越南近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自传这一新体裁。与潘佩珠同时代的阮伯卓、范琼、范文雄等等都写了个人回忆录,但可以说没有谁能像潘佩珠那样生动、切实地把自己完全表现出来,把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其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很好地表达出来。而这,正是《年表》的价值。自传显露了它的新鲜与迷人,宣告了迄今为止的文学样式无法表现的、新的自我方式的诞生。即使是在自传中表露的本人的缺陷,其实也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标志,一种圣贤特有的品质,具有一种“圣化”的象征意味。潘佩珠的革命事业比起后来的成功者胡志明来是百分百的失败,是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但他作为一个人,却因此而展现了他忠于自己本性的正直品格:信守自己的人生理想,坚持自己的人生主张并能为之奉献生命。正如叶灵凤评价歌德的《诗与真》时说,“这一部出自诗人晚年之笔的自传,正是理解匿在他一切作品之后的心灵的锁钥”,“实为了解歌德的最重要的资料”。<sup>①</sup>《年表》是我们了解潘佩珠文学与革命生涯的最重要的材料。总体来说,人们通过《年表》,能看到一位无比崇高美丽的越南人形象。《年表》在潘佩珠的全部文学事业中有重要的位置,他的才华、智慧、情感和风格在自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作品中,一个传统儒士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特的、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形象。潘佩珠以其真诚、崭新的叙事方式带给读者一种观察和思考。这部作品不仅是潘佩珠个人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初爱国和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影响到其后及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爱国文学气象,也具备了许多新文学的因素。

<sup>①</sup> 叶灵凤:《读书随笔·一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72—73页。